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李丽丹.殊途同归:齐普斯与刘守华童话研究比较漫谈[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6(2): 35-38.

殊途同归:齐普斯与刘守华童话研究比较漫谈

李丽丹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摘 要:《从格林童话到哈利·波特——童话故事与儿童文学研究新论》一书集中展示了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对欧美童话的社会历史批评意识,以及对欧美童话的资产阶级属性、父权制倾向和女性歧视的揭露和批判,揭示了欧美童话对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和宗教文化思想的重要作用,直陈欧美童话对巩固父权制社会、寄托乌托邦式愿景的作用。《中国民间童话概说》是中国故事学家刘守华研究中国民间童话的首作,该书运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对中国童话进行分类和主题阐释,为中国民间童话研究奠定了基础,以系列故事的个案形式呈现故事主题的思想价值研究、母题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和叙事的审美意蕴研究。两位学者在童话研究领域殊途同归,展现了童话的魅力和价值。

关键词:童话;故事诗学;杰克·齐普斯;刘守华;社会历史批评

分类号:I10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3)02-0035-04

作为社会历史批评的忠实拥趸,美国童话学者杰克·齐普斯(Jack Zipes,1937~)的民间故事和童话研究一直有着尖锐的批判性,其研究专著已有多部被译为中文出版。2022 年 8 月,中西书局出版了由美籍华裔民俗学家张举文教授编译的齐普斯童话研究论文选集《从格林童话到哈利·波特——童话故事与儿童文学研究新论》,该书采用“资产阶级”“社会公正”“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等有着鲜明阶级意识和斗争性的高频词剖析欧美童话经典,集中展示了齐普斯对欧美童话的批判。从法国佩罗《鹅妈妈讲的睡前故事》(1697)、德国格林兄弟《儿童与家庭故事集》(1812~1857)、丹麦安徒生《安徒生童话》(1835~1874)三大经典童话集,到美国迪士尼公司的童话动画作品和英国作家 J.K.罗琳的《哈利·波特》,《从格林童话到哈利·波特——童话故事与儿童文学研究新论》展示了童话从民间口头到文本记录与改编,再到文学童话乃至银幕展现的演变过程,

以及童话如何在搜集者、改编者和创作者手中烙下资产阶级思想和宗教文化属性的印迹,如何巩固父权制与歧视女性并寄托乌托邦式的愿景。齐普斯所选取的童话个案均为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的经典故事类型,这些类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为以刘守华为代表的中国故事学家所关注、追踪和研究,且中国故事学家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与齐普斯研究极具一致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文化批评方法。但故事类型只是研究的出发点,具体的故事文本才能充分展现讲述者或改编者的个性,同时又代表地域性和民族性文化特征。中国经典民间童话既有故事所共有的人性关怀,又有明显区别于欧美童话的人文特征。

一、欧美童话的资产阶级属性

故事是加强社区和国家团结的纽带。在民间故事学、民俗学领域有奠基之功的格林兄弟,在 1812

收稿日期:2022-12-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民间文学比较研究”(18ZDA272)

作者简介:李丽丹(1979—),女,湖北松滋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民间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民俗学研究。

年至 1857 年对童话进行了 7 次改编。通过各个版本异文、标题、情节、语言的变化,《儿童与家庭童话集》越来越倾向于取悦资产阶级家庭,满足其口味。民间故事的搜集史与文学童话的创作史,是 18 世纪末至 20 世纪新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思想文化潮流的一部分。搜集民间故事是和社会和政治行为,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关注下层人,并发声来保卫民族和国家的语言文化,以捍卫民族国家和正在寻求自治权利的特殊地区和群体的利益。齐普斯指出,应该将 19 世纪所有的搜集者都视为集转录者、翻译者、中介者、教育者、文化启蒙者以及历史学者身份于一身的人。而这本身就是明确而矛盾的意识形态宣言:保护故事不受意识形态影响。“许多民俗学家都过滤或监视了民众的声音,或者修正了说话人的声音,以表达搜集者的思想。有时,搜集者也要向权威和出版商低头。”^{[1](P27)}正是基于对讲述者、搜集者、创作者、出版商的阶级身份、政治地位、意识形态的考量,齐普斯的研究重在揭露童话传播和童话研究中鲜少被意识到的社会历史真实。“资产阶级”这个术语是由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定义的,家庭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基础社会化主体。格林兄弟是德国文化资产者的杰出代表,其成长经历和工作与研究经历都紧紧围绕着他们具有典型性的家庭,他们在童话中大力赞美有序、勤劳和节俭等品质。资产阶级对于民间童话的吸纳与改写,是在农民和贵族之间的一种文化调停与挪用,“中产阶级用来建立他们自己制度和习俗的方式是挪用——借用并侵占财产、商品和下层阶级的文化形式的所有权,并对它们进行改进,从而适应中产阶级文化的情感和希望”^{[1](P83)}。齐普斯通过对童话文类的研究与剖析,无比尖锐地指出,历史上的阶级压迫与阶级利用一直存在,“挪用并不是资产阶级独有的,因为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和殖民主义者一直在侵占他们治理或征服的人民”^{[1](P83)}。在他看来,格林兄弟和安徒生都是文化的“裁缝”,“因为他们一直对自己搜集的故事进行修改和重塑,使其基本上符合资产阶级阅读期待的那种父权制和基督教准则,同时符合他们自己所认为的纯粹的自然的德国文化理念”^{[1](P85)}。

二、欧美童话中的父权制倾向与女性歧视

齐普斯认为,童话这一文学体裁的发展主要是在男性作家建立的话语中发生的,以佩罗、格林兄弟、安徒生甚至 J.K.罗琳为代表的童话作者乃至对

民间故事影响深远的 TU 分类法和芬兰历史地理学派以及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众研究者,均有父权制倾向。最典型的莫过于童话故事中的女性几乎全部被刻板地塑造成被动的女性形象,而被分析的童话女性一边倒地成为男性批判的对象。齐普斯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以格林兄弟为代表的童话改编者、作家和以弗洛伊德与荣格、弗洛姆为代表的批评家及其所代表的父权制与基督教准则,如格林兄弟“删去了故事中可能与中产阶级道德相冲突的色情和性的元素,添加了许多基督教的措辞与相关内容,根据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父权制准则,强调了男女主角特定的角色模式”,而“迪士尼除了将民间故事转变为供大众娱乐的商品之外,还通过赞美男性权力的纯洁而给故事带来重要的变化,强调对可爱温顺的青春期女孩的驯化,赞美干净整洁的美德、轮廓鲜明的美国人物以及一种明智谨慎的生活”^{[1](P88)}。

基于对资产阶级文化本质的探索与批判,齐普斯指出,安徒生通过对本质主义思想的颂扬,创造了通用于儿童与成人的文学童话标准,实际上是在童话中灌输新教伦理与自然生物规律的基本观点,其作品充满了说教目的、行为规范和理想政治标准,以确保利益和资产阶级的统治,维护的是“人生而不平等”的社会阶层分布,是为 19 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统治服务,从而对剥削下层阶级的合理性进行阐释和美化。同时,安徒生在其间还穿插着厌女基调和封建父权制的尊重、对新兴资产阶级价值观下“英雄”的价值颂扬。

而 20 世纪以来美国迪士尼童话最具有代表性的动画作品《白雪公主》《灰姑娘》和《睡美人》等都遵循着“男性至上”的叙述,保留了自格林童话以来关键的意识形态特征,以男性话语构建女性生活,其构建出来的女性形象是符合男性需求的具有欺骗性的被驯化的女性,她们等待、顺从、无助、可爱、勤劳、心地纯洁,并保持对男性上帝的信仰,而男性英雄则是勇敢、机智、礼貌、纯洁的邪恶征服者。“邪恶既不是与资本家和法西斯统治者的压迫统治有关,也不是在平均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发生关系,而是等同于放纵、善妒的女性,等同于黑魔法和肮脏的动作,等同于必须加以清除和控制的动荡中那种不可预测的力量。”^{[1](P89)}正因如此,迪士尼童话甚至消融了格林童话尚还包含的阶级不公和家庭问题的倾向,麻痹观众与读者,不再关注压抑的历史和心理问题,甚至不再渴求去改变现有世界,连女性也在迪士尼童话中继续赞同“男性神话”对自身的驯化,新的技术

不是被用于促进社会变革,而是让无产阶级在幻想中参与权力的掌握和阶层的流动。

三、东西方童话的借鉴与交流

齐普斯童话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宏观建构是以对经典童话个案的长期追踪研究为基础而形成的。“小红帽”“灰姑娘”与《六人走遍天下》代表了 17~21 世纪经典童话背后的资产阶级立场、父权制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歧视女性的男权中心主义。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制度化的现代文明进程中,童话原初具有的意义被掩盖或篡改并终致消失。中国故事学界也一直关注着“狼外婆”“叶限”“水推长城”等同类型经典童话,且在诸种童话研究方法的多方阐释中取得了不俗成绩。

中西方童话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的运用道路有着惊人的相似。中国故事学家刘守华(1935~)在 1985 年出版了首部中国民间童话研究专著《中国民间童话概说》^[2],齐普斯则在 1987 年出版了《格林兄弟:从魔幻森林到现代世界》。当齐普斯编辑包括一则中国“狼外婆”异文在内的 31 个“小红帽”故事集文学版本和研究性“引论”《小红帽的考验与磨难》(1993)时,刘守华正致力于搜集和研究全世界范围内的“求好运”(又名“魔鬼的三根金头发”)故事,并最终在《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2016)囊括 18 个民族 7 个国家的 80 余则异文和 14 篇研究论文^①。

在《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中,刘守华将中国民间童话分为三大类,即反映生产斗争的童话、反映阶级斗争的童话和表现人民道德观念的童话。刘守华从阶级和价值观视角对童话的分类,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民间童话研究个案的重要基础。中美两位同时出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故事学者都慧眼如炬,对童话所具有的社会历史价值有着共同的关注。刘守华所选的“反映阶级斗争的童话”中“狼外婆”“团结对敌”“智胜强敌”“十兄弟”等故事类型,即齐普斯长期关注的“小红帽”和《六人走遍天下》等故事类型,这些故事揭露了不同阶层者的利益矛盾,尤其是弱小的无产阶级对抗侵略者和统治者的故事。不同阶层之间基于生存和发展必然存在矛盾,面对侵略和暴政统治,解决矛盾的途径只有团结与联合斗争。而

在表现人民道德观念的童话中,“灰姑娘”“蛇郎”“青蛙少年”“找幸福”等世界性故事类型,也呈现出齐普斯所批判的父权文化对女性的道德驯化,但更重要的是对于家庭价值与意义的追求与肯定,和以勤劳、善良等美德来反抗不公平命运、打败贫穷的共性价值认定。

情节类型具有相似性的中外童话即便是以相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也有不同的文化意蕴。如中国童话中的女性独立意识更为鲜明,中国的“狼外婆”“叶限”故事最早的记录本均早于欧美,出现在 9~11 世纪,20 世纪以来的民间文学搜集活动中更是涌现了众多异文。这些文本在故事的性别构成、故事的情节设置与结局安排等方面,都有别于西方文化中的女性形象。中国童话中的女主人公在故事中往往是勇敢地走向外部天地,哪怕面临着种种未知的危险,甚至面对母亲和姐妹被狼吞噬的惨痛或被继母虐待的痛苦,也从来没有放弃自救的努力。她们可能会接受来自外界的帮助,但最核心的力量仍旧来自姐妹之间的团结和对自我力量的认知。“狼外婆”与“灰姑娘”在中国当代的童话中仍然在不断发展演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经典儿童节目“小喇叭”中的《果园姐妹》以“狼外婆”童谣为基础进行改编,虽然刻意去除了母亲与小弟弟/小妹妹被大灰狼吃掉的情节,与西方童话在发展曾经遭遇的一样,尽可能舍弃了民间口头叙事中的血腥和残忍情节,但始终是以姐妹自救为中心。中西方同类型童话存在差异,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智慧的尊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尤其是近百年来女性解放事业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同样反映在童话的演变发展之中。

齐普斯将《六人走遍天下》视为阶级斗争和复仇的故事,是“合作和为战胜暴政而采取激进行动的故事”,故事中的六个非凡的英雄“正是通过集体行动、各种力量的联合和整合,才创造了社会正义所必需的力量”。“非凡的英雄”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弱小胜强大”主题的童话故事^{[1](P225)}。中国的《水推长城》(又名《十兄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故事,以此为基础的经典动画片《葫芦兄弟》是数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中国的这些阶级斗争类故事蕴含着对理想世界的“秩序回归”,而不仅仅是对于

① 刘守华:《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版;《刘守华故事学文集》(第二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正义的寻求,也不是简单的激进行动故事。如有着悠久童话传统的魔幻小说《西游记》,讲述武力值为零的无能“英雄”唐僧在包括白龙马在内的四个师兄弟的帮助下,一路降妖伏魔的奇幻历程,通过合作寻求理想的实现和乌托邦秩序的回归。中国的“水推长城”或“非凡的英雄”类童话以及由此而演变发展的同类题材童话,往往不以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秩序为目的,而是将公平公正的理想世界秩序的恢复视为斗争的目标,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谦逊博爱的精神。

四、从比较走向整合:中国故事诗学研究体系的建构

“任何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在同整体的比较当中决定的。”当我们注目世界范围内流传的同类型童话,更能够在比较中体悟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如与“弱小胜强大”型的日本童话《桃太郎》、欧美童话《拇指汤姆》及《布莱梅镇的音乐家》等相比较,中国此类童话中的弱小者从来都不是主动出击者。桃太郎主动请战去挑战和征服鬼岛,带回财富;中国童话中核桃小子的反抗并不以掠夺为目的,而是要寻求不被强权欺压的安宁生活。欧美学者强调《布莱梅镇的音乐家》是面向老年人的童话,是老年人的一种心理折射与安慰;中国面向老年人的童话中从来没有“以暴制暴”的财富掠夺。而在《布莱梅镇的音乐家》中,老驴、老狗、老猫与鸡在从强盗那里抢来的屋子里从此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弱小者团结起来战胜强大的西方童话呈现了抢夺强盗的不义之财而据为己有是公正合理的“正义逻辑”;中国著名的《小鸡崽复仇》和《狼外婆》童话中,弱小联合起来反抗的始终是意图入侵的强暴者,而非对外的侵略与扩张。凡此种阶级斗争型童话中,都可以见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立场和仁爱而不盲目、独立而无所畏惧的国族精神。

齐普斯的研究个案主要以欧洲和美国童话为对象,而中国童话研究往往既关注本国和亚洲,也持续关注世界其他国家的童话。其中以刘守华 30 余年对世界范围“求好运”故事的搜集和追踪研究最具有代表性。在立足于东西方同类型故事的比较研究

中,刘守华指出:同样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西方童话侧重的是宗教关怀与信仰,中国童话表达的是善良战胜邪恶、先人后己和兼爱天下的墨家精神,是中国底层民众最朴素的哲学思想。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衡量和评价文学作品,才能在关注童话外部特征的同时,深入分辨其内部形成,更加深入地理解童话的产生、发展和传播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从而形成更为系统的童话分析。

齐普斯以欧美童话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历史视角进行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其童话研究理论成为欧美文化大工业时代民间童话改写和创作的指导。而中国的文化建设一直致力于“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984 年,国家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展开“民间文学大套集成”的普查、编辑和出版工作,2018 年,“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启动,这两大工程都是以记录、保护和传承人民的精神文明创作成果为本,从国家层面为中国民间故事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口头记录文本。民间童话是中华民间文学、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当下有着巨大的潜力,也以其类型的相似性更能够与世界平等交流和对话,从而更好地展现既热爱和平也不惧强权的中国形象。“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须坚持故事学的学科本位,夯实学科基础,积极吸纳其他学科方法和新技术,深入挖掘本土资源,关注现代社会民间故事的复杂生存状态,才能化危机为转机,建立故事学的‘中国话语’。”^{[3](P215)}

参考文献:

[1](美)杰克·齐普斯.从格林童话到哈利·波特——童话故事与儿童文学研究新论[M].张举文,编译.上海:中西书局,2022.

[2]刘守华.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漆凌云.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论:1949—201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特约编辑 桑俊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